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 政治文化生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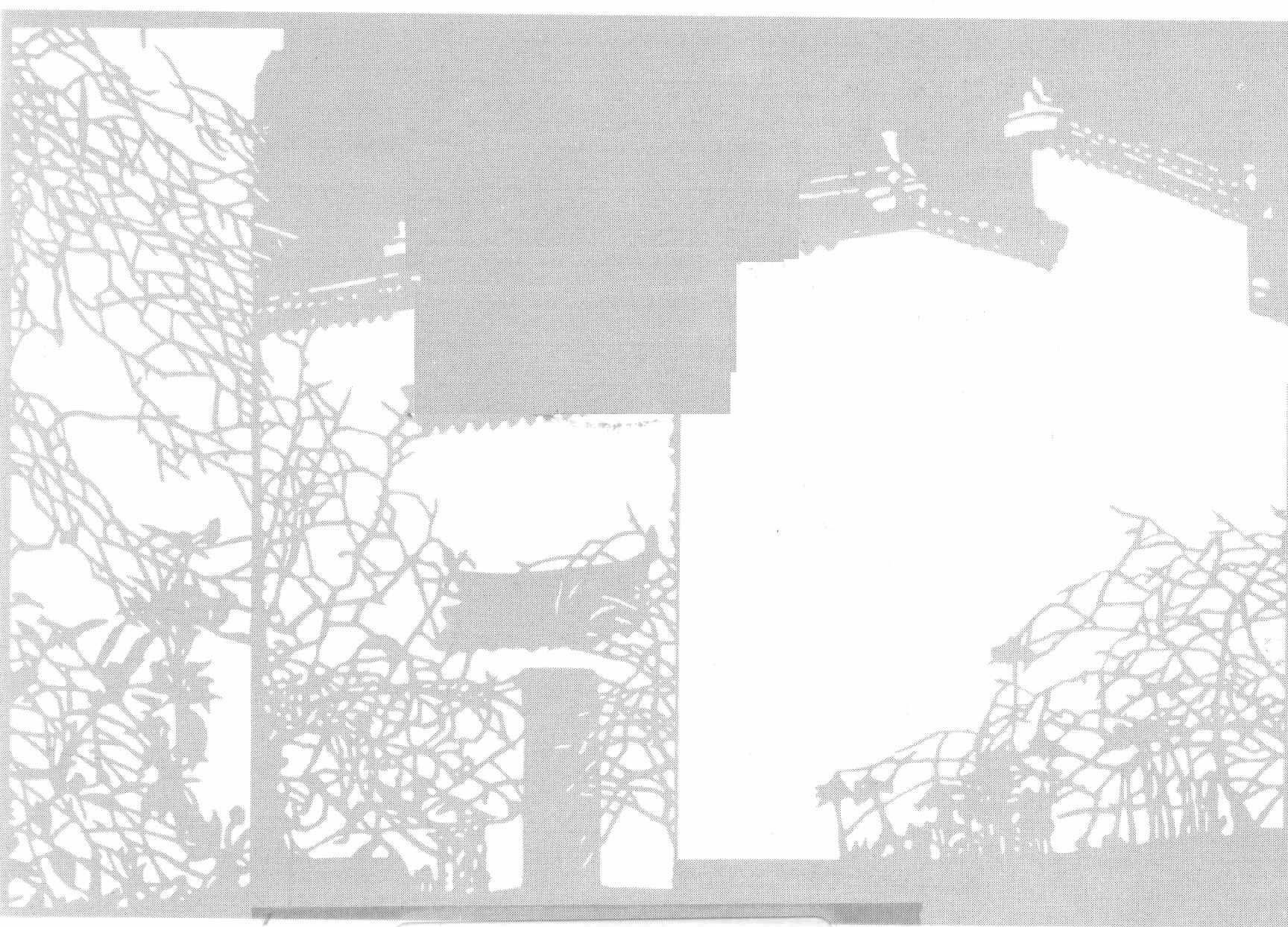
张
贞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 政治文化生态研究

张
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生态研究 / 张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5161 - 9189 - 7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研究—中国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13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罗 莉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6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生态研究”（11YJC751124）最终成果

本书获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本书获湖北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生存语境 (6)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 (7)

 第二节 消费社会背景 (14)

 第三节 文化研究视野 (19)

第二章 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体系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25)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现代化转型 (25)

 第二节 公民文化发展影响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体系 (28)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体系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33)

第三章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对象的政治文化生态研究 (39)

 第一节 “主旋律”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话语表述 (40)

 第二节 精英文学：消费主义社会语境中的坚守和突破 (55)

 第三节 大众文学：技术、民间、商业制约下的时代蜕变 (64)

第四章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类型的政治文化生态研究	(76)
第一节 自媒体批评：自发批评的时代话语	(76)
第二节 职业批评：学院派的兴盛	(104)
第三节 作家批评：审美与接受的“对话”	(116)
第五章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精神的政治文化生态研究	(129)
第一节 判断与创造：精英文化的时代吁求	(129)
第二节 坚守与锤炼：主流文化的价值选择	(135)
第三节 平民与世俗：大众文化的双刃剑	(141)
第六章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生产体制的政治文化生态研究	(147)
第一节 学院派批评生产体制的政治文化生态考察	(149)
第二节 新媒体批评生产体制的政治文化生态考察	(153)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生产体制的问题审视	(157)
第七章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关系的政治文化生态 研究	(161)
第一节 主流文化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163)
第二节 精英文化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168)
第三节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174)
结语	(178)
附录一 从壁垒森严到互联网链接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调查的一个图景	(181)
附录二 从文化生态视角看新世纪以来的湖北文学创作	(187)
附录三 中国文艺电影的一个文化症候：从《白日焰火》 说起	(196)

附录四 论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意识的渐变	(204)
附录五 论延安文艺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启示	(213)
参考文献	(224)

导 论

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元理论”遭到普遍质疑，“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学者们在对批评精神、批评方法、批评主体、批评话语的多话题讨论中建立了一种开放的、动态的、丰富的、复杂的、发展的研究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语境的转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发生了变化，对“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随之有了新的进展。目前，学术界主要立足于现代社会的背景来研究“文学批评”的热点问题，如对消费社会语境中的文学批评形态的研究、对价值多元化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功能的探讨、对大众传媒影响下文学批评话语的改变的分析、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关系的反思等。近年来，在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中，“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个关注重心。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立场，最初是指“关于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后来，生态批评的范围逐渐扩大，开始从更为宽泛的文化层面来考察文学艺术，不仅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而且关注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乃至用生态的思想观念——和谐的、动态平衡的观念来研究文学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学批评生态”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比如说，文学批评如何超越“中心论”和“二元论”，用去中心的、复杂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来评判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如何坚持“和谐美学观”，既正确地把握当前的文学生存空间、文学体制等宏观问题，也注重对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及具体文本的深层细读，并积极寻求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文学批评如何立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进程，科学地解决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

展；文学批评如何在市场化的言说空间、消费化的言说方式和网络化的批评格局中应对视域全球化、传播媒介化、运作市场化的新型文学；文学批评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形态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问题的繁杂使文学批评生态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文学批评生态的研究还停留在一个众说纷纭的阶段，既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又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过于泛化的现象。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批评生态进行具体化、细化和深化的研究，并逐渐为文学批评生态研究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文学批评生态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必然趋势。

在将文学批评生态研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的过程中，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生态、学科知识生态、学术话语生态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政治文化生态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角度，都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制约。

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国家、民族、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及其影响下的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观念形态体系。这个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①阿尔蒙德强调了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②，“是由认识上的、感情上的和价值上的因素组成的。它包括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意见，包括对政治和政治的价值观念的情感”^③。沿着这一思路，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主要从“社会心理”层面展开对政治文化的深入拓展性研究，比如：阿尔蒙德、鲍威尔和沃巴从心理或主观角度出发，研究某种政治制度中所有成员关联政治生活一切方面的主观取向；伊斯顿从客观角度研究信念、规范、价值等对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影响；锡尼·维巴指出政

①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 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美] G. 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黎译，《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治文化“不是指正在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指人们对这些事情所抱的信念”^①，白鲁恂主张集中研究那些对政治制度运行起作用的关键心理元素等。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不同于以往人们在提到“政治”时所暗指的“阶级斗争”，而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等观念形态体系。

与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思路不同，苏联学者强调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认为对主体心理动因、主观态度的研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真正的政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李春明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政治文化内涵的论述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宏观化的政治文化定义，认为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还包括政治理论及政治制度；第二类是中观的政治文化定义，主张将政治文化视作与实体政治相对的观念性的东西，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与价值的综合；第三类是微观的政治文化定义，基本上认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的观点，主要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研究政治文化^②。考虑到本书的研究主旨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相对于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来说，政治文化的社会心理对此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我们主要采用微观的政治文化定义，在“社会心理”层面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具体到文学活动，“政治文化”既是我们考察文学活动的研究背景，也是我们进行具体文学活动的主要途径。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活动一直和“政治”元素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五四文学对于“革命救亡”政治环境的依附，延安文学时期“文学服务于政治”口号的提出等。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元素并不直接介入或指挥文学活动，而是更多地通过“政治文化”体系影响文学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近年来，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

① 转引自〔美〕道森（R. E. Dawson）、普雷维特（K. Prewitt）《政治文化》，郑永年译，周士琳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12期。

② 具体论述参见李春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文学活动的成果逐渐增多，比如：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从文学机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层面讨论了“社会主义文学制度”如何制约和规范中国当代的文学观念、作家思想、作品创作以及读者阅读；张钧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949—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分析了此时期的文学组织制度、文学出版制度、文学批评制度和文学接受制度，及其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李洁非、杨劭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历时性地考察了文学体制、文学政策及其监管、文学会议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生产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成果的研究范围较广，文学批评只是其考察对象之一，并未得到细致深入的探讨。同时，由其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决定，这些成果在探讨“政治”元素如何通过文化心理来影响文学活动时，大多依循“从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强调政治体制、政治决策对文学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以朱晓进的《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为例，本书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文化”的理论视野和切入角度，也强调了“政治文化”不是现实的政治决策，而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的政治行为乃至其他行为。但从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因为该书的考察对象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政治体制关系十分密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政治化的源头，所以该书偏重于分析政治体制如何通过文化心理影响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氛围、文学群体、文学论争、文学批评、文学导向、文学创作选择和文学风尚，探讨此时期文学现象背后的政治体制根源及其具体的影响表现。也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语境中，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内容更偏向于上层政治体制，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全面影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和新媒体的颠覆性入侵，无形中悄然改变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生态体系和内部构成。具体来说，“政治”概念的“阶级”意味逐渐弱化，“阶层”意味日益浓厚，影响人们心理的“政治文化”从显在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逐渐转向更为复杂幽深的社会心理层面，即“政治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化、

现代化，公民文化逐渐形成。因此，本书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语境，将考察对象设定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致力于从社会心理层面研究大众文化兴起、互联网流行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体系，及其影响下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

第一章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生存语境

文学批评是一门既追求系统知识又强调时代活力的学科。一方面，文学批评并不从属于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正如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文学批评不是文学的寄生虫，而是“按照一种特定的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的”^①，有其自足的思想 and 知识结构。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观念、标准和体系应来自鲜活的文学现象，雷内·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进一步延展和明确了“文学批评”的概念，认为弗莱所轻视、嘲笑的“文学风尚史”批评恰恰是文学批评的缘起，因为“历史上每个批评家都是通过接触（正如弗莱本人一样）具体艺术作品来发展他的理论的，这些作品是他得去选择、解释、分析并且还要进行评价的。批评家的意见、等级的划分和判断由于他的理论而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而这些理论也从艺术作品中吸取养分并得到例证的支持，从而变得充实和言之有理”^②。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及其影响下不断更新的文学现象，过去的历史、知识和标准只能给我们提供有限的帮助，真正有效的文学批评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社会语境，运用我们“最广博的知识，最仔细的观察，最敏锐的观察力，最公正的判断”，从众说纷纭中理出眉目，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做出解释，最后得出评价”^③。也就是说，研究某个时期的文学批评，首先必须客观认识这个时期的社会语境及其影响下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从

① [加]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 页。

② [美] 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③ 同上书，第 15 页。

中发现文学批评的时代性、丰富性和前瞻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生存语境,有利于我们客观深入地探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并将之行之有效地运用到当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批评。从急遽兴起的网络写作、私人写作,到充满消费主义色彩的文学活动,再到全面革新的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方式,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需要面对的生存语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同时,网络用户从电脑客户端向手机客户端的转换力度正在加大,网络使用越来越便利。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进入互联网时代。

麦克卢汉说:“媒介将重新塑造它们所触及的一切生活形态。”^①互联网时代的来临,首先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关注对象,曾军在《有限包容及其文体——“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新媒体文学”》中提出,自1998年第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流行以来,网络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BBS网络文学、文学网站网络文学、电子杂志文学、博客文学、手机文学等多种亚类型^②,这些新出现的文学类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亟须关注的对象。

面对这些新兴的文学类型,文学批评需要迅速更新自己的观念体系和评判标准,对之进行及时而客观的评价。以电子杂志文学为例,这一

①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6页。

② 具体论述参见曾军《有限包容及其文体——“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新媒体文学”》,《文艺争鸣》2011年第2期。

诞生于新媒体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类型具有全新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特征。从前者来说,电子杂志文学依托建立在现代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现代科技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媒体写作的内容直接挪移到新的传播载体上,而是开启了全新的现代化写作方式和写作行为,“从传统的手工写作转变到以电脑等智能设备进行信息处理,使写作主体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这种转变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①。传统的杂志出版周期长、传播速度慢,电子杂志则可以做到每日更新、随时阅读,并且能将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表达手段融为一体,使读者获得丰富的感官体验。

从后者来说,电子杂志在遵循网络“自由写作”规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以韩寒的《ONE·一个》为例,这本杂志以热爱文艺的18岁至35岁用户为目标读者群,其文本内容经过了人为的以一定目的性为标准的筛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网络写手兴致所至的随性涂鸦,而是受到了某种共同写作趣味的遴选。同时,因为受到电子文艺杂志版面和更新频率、运行方式等的限制,缺少了部分类似于网络文学和博客文学天马行空式的自由,多了一些纸质文学“戴着镣铐跳舞”的意味。这种经过打磨后的半自由式写作,提升了文本的质量和思想深度,凝聚了具有共同欣赏趣味的受众,为文学类电子杂志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保障。

但是,过于绚丽的影音效果是否就一定符合文学的审美要求?即时更新的文本内容如何让受众产生深远的审美享受?半自由式写作凝聚起来的受众群又如何实现自己的主动性?电子文学杂志是否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都需要文学批评及时跟进、深入思考。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带来新的批评对象之外,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改变了文学批评的传播途径、传播模式并进而催生了新的文学批评类型、革新了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在传播史上,“受众”的位置和作用一直是各大理论思潮关注和争论的重要议题。“直接效果”论者把受众视为没有自主意识的个体,认为受众完全被传媒操控,只能像病人一样任由传媒煽动或者被传媒传递的思维定式洗脑。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

^① 何坦野:《新媒体写作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强烈批判文化工业对艺术的侵蚀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某种程度上也根源于其对“媒介受众”被动性的认定：文化工业通过大量的机械复制将一致化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受众，占据个人的闲暇时间，影响人们的见解和判断，甚至生产受众的需求，使受众在日复一复的被轰炸中失去理性和独立的思考。法兰克福学派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使其居高临下地将受众看作没有任何主动意识的一块铁板，阿多诺甚至认为“研究公众对广播节目或电影的反应就已经是对文化工业的妥协”^①，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手法，使研究结果正好证实了他的假设。

然而理论总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凸显问题又不断引起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补充，面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悲观主义，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分别从犯罪小说、奥芬巴赫轻歌剧、白领文化和电影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公众的存在”，认为传媒的进步与发展赋予了一部分人更多的表达空间和发展能力的机会。拉扎斯菲尔德更是提出了“有限效果论”，认为传媒并不能在公共事件中完全操控民众，“投票不单是传媒策划的选举运动导致的个体的偶然选择，而是取决于阶级、地理区域和宗教这三个变量”^②，每个个体在接收传媒传递的信息之前首先是隶属于某个或某几个团体（如家庭、学校、朋友圈子、工作单位、协会等）的“社会人”，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受众会用自己已有的认知系统对信息进行过滤，加以选择、分类、剔除、修改甚至是扭曲。因此，“公共传播的经典矛盾就是：教育性质的节目触及的总是那些已经受了教育的人，而不是节目制作方希望教育的对象。在公共传播中得到强化的总是已有观点，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在人总是对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更感兴趣，对其他信息则兴趣不大”^③。在1955年出版的《个人影响力》中，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生艾利休·卡茨通过深入调查，进一步发展了二级传播理论，提出“人际传播的影响大于媒介传播”、“舆论领袖不是永远对追随者发挥影响的人”（他们在某个领域中是领导者，在其他领域

① [法] 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中则会变成追随者)、“公众有反思和适应的能力”等观点。有限效果论虽然不免落入重视实证而轻视意识形态分析的窠臼,但它对“受众”主动性的发现开启了传播学的另一个新起点。

正是在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基础上,英美文化研究学派开始致力于研究文化接受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细节和多种可能性。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深入剖析,斯图亚特·霍尔关于“认同、反抗、妥协”三种解码的解读,德赛都的“假发策略”,某种意义上都是把受众置于和文化生产者、传播者平等的位置上,更加关注个体经验在文化活动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入研究受众主动性的过程中,学者们逐渐发现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受众的年龄、性别、家庭地位、学习工作情况、收入水准、家庭环境、文化素养、政治观念及其所隶属的社会阶级、所接受的教育、所居住的地点、个人的品位和偏好、对媒介的需求、使用媒介的习惯等,都会对个体的文化接受效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媒介体系、媒介特征、可提供的内容、传播的时机和呈现的形式等,也都会对受众的实际接受产生影响。因此,受众的形成是复杂而多样化的,受众是一个时刻变化着的群体,并没有任何一种确定的描述或者是单一的理论能够解释受众的接受行为,人们和媒介相互满足,彼此共存。但这种状态不太容易通过操纵或宣传来达到,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社会需求或在媒介创造力与公众品位的结合中产生。

在充分认可受众主动性及其复杂构成之后,传播学理论在受众研究中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分歧,即“以媒介为中心”还是“以受众为中心”。两种研究思路都会重视对受众的分析,但前者的目的在于操纵并引导受众的选择行为,寻找受众的市场机会,进行产品测试并提高传播效率;后者则以受众视角来评估媒介表现,测量受众选择与使用的动机,弄清受众对意义的阐释,并由此履行服务于受众的责任。所以约翰·费斯克在考察了各种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模式之后,将其区分为过程模式和符号模式,认为过程模式强调的是如何将意义有效地传递给受众,符号模式则强调传播发生的前提是使用符号来创造讯息,“这一讯息会刺激你产生自己的讯息意义,但是你的讯息意义某种程度上和我创造的讯息意义相关联。我们共享的传播代码越多,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